

揚雄的範式研究

西漢末年學術範式衝突的折中之例

馮樹勳 著



揚雄的範式研究

西漢末年學術範式衝突的折中之例

馮樹勳 著



揚雄的範式研究：西漢末年學術範式衝突的折中之例／
馮樹勳著．-- 初版．-- 臺北市：臺大出版中心出版：
臺大發行，2015.07
面；公分．--（中國思想史研究叢書；16）

ISBN 978-986-350-085-8（平裝）

1. (漢)揚雄 2. 學術思想 3. 秦漢哲學

122.5

104011484

中國思想史研究叢書 16

揚雄的範式研究——西漢末年學術範式衝突的折中之例

作 者 馮樹勳

叢書主編 鄭吉雄 伍安祖
總 監 項 潔
責任編輯 陸勁蓉
文字編輯 戴嘉宏
助理編輯 王培雯
封面設計 上承文化有限公司
內頁排版 新鑫電腦排版工作室

發行人 楊泮池
發行所 國立臺灣大學
出版者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法律顧問 賴文智律師
印 製 大光華印務部
出版年月 2015年7月
版 次 初版
定 價 新臺幣350元整

展 售 處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臺北市10617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電話：(02) 2365-9286
臺北市10087思源街18號澄思樓1樓
電話：(02) 3366-3993轉18
E-mail：ntuprs@ntu.edu.tw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臺北市10485松江路209號1樓
國家網路書店

傳真：(02) 2363-6905

傳真：(02) 3366-9986

<http://www.press.ntu.edu.tw>

電話：(02) 2518-0207

<http://www.govbooks.com.tw>

GPN：1010401051

ISBN：978-986-350-085-8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目次

引 論

第一章 問題發端及方法論反省

一、揚雄在西漢思想史的重要性	003
二、取捨相反的學術評價	004
三、文本選取與人文視角／視障	007
四、比對研究法的進路	010
五、反省研究法的作用	012
六、人文價值與知識取向的詮釋限度	014
七、範式衝突內的學術道路	017
八、結語	021

本 論

第二章 揚雄初仕與為郎考

一、揚雄生平之考訂	025
二、〈答劉歆書〉的寫作時年	027
三、從〈答劉歆書〉看揚雄的至京與初仕	033
四、揚雄初仕之政治主張與為郎經過	038
五、結語	050

第三章 揚雄的美學思想

——揚雄對西漢儒家審美觀的反省

一、揚雄美學之爭議	053
二、先秦與兩漢藝術觀點的殊異	054
三、個體感受與美感經驗	058
四、美學的功能與本質之辨	065
五、恰如其分的表現與情趣：文與質	074

第四章 《太玄》的思考及其思想架構

一、《太玄》之探究	085
二、「玄」的內涵與作用	087
三、自陰陽而三儀	099
四、《太玄》與曆法	107
五、五行與音律	128
六、結語	136

第五章 《太玄》與《易》的「殊塗同歸」關係

一、《太玄》與《易》	141
二、「擬易」說	142
三、「擬易」說的困難	147
四、「準易」說	158
五、孔子主導的《易》學範式轉移	162
六、西漢《易》學的「殊塗」與「同歸」問題	169
七、《太玄》與《易》「殊塗同歸」關係	175
八、結語	183

第六章 《太玄》儒、道思想歸趨辨

一、儒、道主從的爭論	187
二、《太玄》討論的文本選擇	194
三、評騭《太玄》思想主從的原則	198
四、作者自行定斷的準則：「仁義」	201
五、從「玄」看《太玄》儒、道思想分野	204
六、儒、道思想的「陰陽」觀與《太玄》	210
七、從文、質觀看儒、道思想的別異	216

八、結語	221
------	-----

第七章 類我與自主的調和問題 ——揚雄教育思想研探

一、揚雄與「類我」	225
二、今學的類我教育觀	227
三、古學的類我教育觀	244
四、類我與自主的調和	257
五、結語	268

結 論

第八章 是摹擬還是創新？——範式衝突內的揚雄

一、揚雄的批評哲學	275
二、摹擬與批判的第一聲——屈賦創作	276
三、揚雄賦作的摹擬與批判	283
四、揚雄《太玄》對《易》是摹擬？是改造？	293
五、摹擬的極峰——「類我」教育範式	299
六、揚雄何以在範式衝突漩渦中要作摹擬？	304

引用書目	309
------	-----

人名列表	329
------	-----

引 論

第一章 問題發端及方法論反省

一、揚雄在西漢思想史的重要性

揚雄是西漢末年最重要的學者，班固《漢書·揚雄傳》贊云：「（揚子雲）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¹同時，〈揚雄傳〉也是班固花上最大篇幅作出闡述的列傳，其受班固的重視，可謂無可置疑。而桓譚《新論》則以為「張子侯曰：揚子雲，西道孔子也，乃貧如此。吾應曰：子雲亦東道孔子也。昔仲尼豈獨是魯孔子，亦齊楚聖人也」。²

即使到了現代，誠如徐復觀指出：「假定講漢代思想史而不及揚雄，我覺得便沒有掌握到兩漢思想演變的大關鍵。」³蓋揚雄所以

¹ [漢]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3583。

² [漢] 桓譚：《桓子新論》（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頁6-7。

³ 參徐復觀：《兩漢思想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5年），卷2，頁303。

被喻為「西漢學術界的殿軍主帥」者，以其學術跨度之大，超出同時學者甚多。揚子雲除了在文學上與司馬相如齊名外，亦是西漢少數具有文學反省意識和理論的學者；在思想方面，他以《玄》準易，倣《論語》而作《法言》，都在漢季哲學史上，有一席之地；至於政治思想方面：十二州箴、二十五官箴等，皆享名於後世；歷史學方面曾欲繼史遷續《史記》，又作《蜀王本紀》，雖皆殘闕，但從《法言》中對先秦兩漢主要政治或思想家均有評述看來，則揚子雲未嘗不究心史學；其《方言》之作，更是中國語言學史的先聲；甚至在天文和曆法等方面，撰有《太玄》與曆象和《難蓋天八事》等作品；以至尚有《琴清英》等藝術討論及《連珠》等新創文體。凡斯種種，足見揚雄是兩漢中僅見的多元化知識分子，這與漢代有強烈「政治性的道德感」⁴的學者，有著明顯的別異。揚雄有極強烈的求知欲望，儘管已屆七十高齡，仍然向掌管渾天儀的老工問以天文之學，⁵這種「朝聞道，夕死可矣」⁶的精神，驅使他不斷反省自己的思想、志業以至藝術創作的種種問題。

二、取捨相反的學術評價

由於揚雄思想範疇跨度甚大，可以探索的領域極多；而揚雄在學問上多方面的成就，普遍亦受到學界的認同。不過，揚雄在學界最令人注目的，是他乃中國學術史上，最富爭議的思想家之一。

⁴ 參徐復觀：《兩漢思想史·揚雄論究》卷2，頁321。

⁵ 桓譚《新論》載：「揚子雲好天文，問之於洛下黃閔以渾天之說，閔曰：『我少能作其事，但隨尺寸法度，殊不曉達其意，然稍稍益愈。到今七十，乃甫適知己，又老且死矣。今我兒子愛學作之，亦當復年如我，乃曉知己，又且復死焉。』其言可悲可笑也。」桓譚：《桓子新論》，頁20。

⁶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71。

譽之者以為揚子雲「才智開通，能入聖道，漢興以來，未有此人也」；⁷毀之者則認定「（揚）雄之學，自得者少。其言務擬聖人，靳靳然若影之守形，既鮮所發明，又往往違其本指，正古人所謂畫者謹毛而失貌者也」。⁸不惟古代學者有取捨相反的觀點，即近賢研究揚雄的論著近三百種，⁹然而，學界對揚雄思想詮釋的對立評價，不但沒有愈益收窄，反而論辯有更趨激烈的傾向。單以揚雄的作品《太玄》與《法言》孰為優劣的問題，近賢竟有輕重完全相反的評價。¹⁰

同時，由於揚雄思想涉及的範疇甚廣，是以研究者多僅能就揚雄思想某性之特定範疇，作出焦點式的探究。然而，作為思想家的揚雄，其成學與心路歷程，固有多端的變化，但卻自青年以後，即確立了自身的研究方向。如果僅就子雲不同時期的學問，作片鱗隻爪的考察，實難逃瞎子摸象之譏。至於近賢對揚雄作全面探究者，近二十多年則僅 1989 年黃開國《一位玄靜的儒學倫理大師——揚

⁷ 桓譚：《桓子新論》，頁 21。

⁸ [明]曹學佺：《揚子法言十三卷》，《蜀中廣記》，《四庫全書》第 59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525。

⁹ 參陳麗桂：《兩漢諸子研究論著目錄 1912-1996》（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98 年），頁 255-271 及《兩漢諸子研究論著目錄 1997-2001》（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3 年），頁 121-125。

¹⁰ 例如劉韶軍以為：「其（揚雄）深思之結晶聚于《太玄》，深思的歸結點仍是指導個人的人生，與早年所思終始相合。《太玄》之後，又作《法言》，乃應付時人之作，而《太玄》乃為聖哲知音所作，二者份量在揚雄心中，本自不同。唯世人難艱而好易，故治《法言》者眾，理《太玄》者稀，豈揚雄之知音哉？」見氏著：《太玄校注·前言》（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 年），頁 6；而郭君銘則指：「筆者認為，在揚雄思想研究中，存在著最突出的問題是重《太玄》輕《法言》」。見氏著：《揚雄《法言》思想研究·引言》（成都：巴蜀書社，2006 年），頁 4。

雄思想初探》、¹¹1993年沈冬青《揚雄——從模擬到創新的典範》¹²及2000年王青《揚雄評傳》¹³幾書而已，其餘皆僅能道揚雄思想之一脈耳！由此可見，揚雄在學術上的地位如此重要，全體性的研究卻不多，實有進一步探索的必要。

筆者並非認為，前賢種種爭議均可以藉本書求得解決。相反，本書力圖探究何以種種難以共容的印象，均集矢於揚雄身上？追本溯源，人文學是視點和詮釋討論的學問，對同一現象的不同詮釋，很多時候是因著視點的不同，而可以有不同的理解，這是一項不容否認的事實。亦由於視點的分歧，因之絕對準確的詮釋當然不可得。然而，這卻並不表示人文學的論述，全部都不過是觀點與角度或全然是「相對」的，更不表示詮釋「並無標準」。詮釋是以「文本」為基礎的，猶如史遷面對「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的五帝紀傳，他提出的原則是：「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¹⁴對於視點與詮釋間的解釋能力而論，恐怕也是「總之不離文本者近是」。我們可以通過一定的準則，對不同視點與詮釋的「解釋力」，作出對比，以見出何者更能切合於文本：

¹¹ 黃開國：《一位玄靜的儒學倫理大師——揚雄思想初探》（成都：巴蜀書社，1989年）。

¹² 沈冬青：《揚雄——從模擬到創新的典範》（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3年）。

¹³ 王青：《揚雄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¹⁴ [漢]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第一》，卷一，頁46：「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 愈能涵蓋更多的「文本」相關項目，愈具有解釋力；
- 相反來說，愈與「文本」內相關項目構成矛盾的，亦愈缺乏解釋力；
- 愈能與「文本」的「發言者」和「學派」的觀點「相容」的，亦愈具解釋力；
- 愈能與作者當代關注問題接軌的，則愈具更高「相容／接受」程度。

雖然，在客觀事實不能全然完備，「書缺有閒」而又未「見於他說」的條件下，我們僅能說這些自認為「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的「結論」，不過是「近是」而已。如能以不同的論述與詮釋相互比照，亦不難找出較具有解釋力的論說角度。本書所為正為已具備多元視域的揚雄，以視域比照的方法，找出現時最具詮釋力的視點。為便於後學對本書各議題的辨析方法有較全面的理解，故擬於本章中對人文視角的偏折、甚或扭曲的情況與緣故，以具體事例作說明，並導之朝較具解釋力的方向而趨。饒有興味的是，有時人文視角的偏差，亦可以幫助我們更準確地調適視點，其中種種「弔詭」之處，將於下文各節引例略予說明。

三、文本選取與人文視角／視障

本書對不同類型的視點偏蔽，有所反省。我們試圖自外而內，察看這些可能障礙或扭曲視點的種種問題。本節先由文本選擇談起：

首先，文本是詮釋的基礎，但選擇哪些文本作為參照，卻足以

影響詮釋的結果。人文學者無不以「文獻分析法」蒐集、鑑別及整齊所需研究資料。對揚雄生平的討論，傳統的研究進路，基本上都依賴《漢書》作為主要參考文本，如不載於班書，則文本的真偽，隨時也可能面對質疑。¹⁵ 然而，在探究班書對揚雄的記述，先輩學者業已指出，《漢書》內〈揚雄傳〉與〈紀〉、〈表〉，以至〈答劉歆書〉和《七略》等，均有無法調和的衝突在。是則，依賴《漢書》作考訂文本的唯一根據，很難免去孤證不立的嫌疑。

因之，本書第二章即針對《漢書》並沒有載入的兩封書信：〈與揚雄書〉及〈答劉歆書〉兩函，辨別其真偽，並透過小心的文本推證工夫，我們可以推定〈與揚雄書〉和〈答劉歆書〉兩函的寫作年限。以〈答劉歆書〉為主要參照文本，可以準確描述揚雄的初仕經歷，並解決許多近賢困擾多時的問題。依本書第二章的考證，劉歆〈與揚雄書〉當成於元始五年（5）劉歆受王莽重用封侯後，更可能是在居攝元年（6）劉歆勢力日見鞏固之時；揚雄〈答劉歆書〉的成書上限，則當在居攝元年（6）四月，張伯松受封為淑德侯，聲光乍起以後，而非目前學界一般認為，當在天鳳年間（14-19）。

以〈答劉歆書〉為「定盤針」，則可推定：揚雄大抵於陽朔元年（24B.C.）完成〈反離騷〉的創作，即自蜀向長安遊歷。陽朔三年（22B.C.），揚雄年 33 歲，值大司馬大將軍王鳳薨，由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繼任，王音任用揚雄為門下史，並薦舉其人；而蜀人為郎的楊莊，則薦揚雄之文，以為似司馬相如。成帝因此於陽朔四年

¹⁵ 即以《方言》一書為例，由於《漢書·藝文志》及《漢書·揚雄傳》均不載，故自宋朝以來即有疑為偽託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尚以為：「反復推求，其真偽皆無顯據」。見《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冊，頁821。

(21B.C.) 任用揚雄為郎官，而劉歆早已於河平年間 (28-23 B.C.) 任職為郎，王莽則已於前一年藉由王鳳遺薦受任郎官，故確有與揚雄同官之事實。建平四年 (3B.C.)，揚雄奏上〈諫勿許單于朝〉一疏時，猶不過黃門郎而已，與在建平三年 (4B.C.) 左右，給拜為黃門郎的董賢，亦確有同官之實。此外，揚雄四大賦的創作日期，亦可以大抵得而確定了。筆者採用了《漢書》未載的〈答劉歆書〉為藍本，與史傳的內容作對照，反而較易看出歷史事實的不同面貌。由是觀之，則能於關鍵的第一手材料作考訂，確可以對揚雄中年以前經歷，有一比較確定的了解。

更有進者，則本書第二章，亦說明了系列文本間的關聯，以與單一文本的取態作互證的方法，在人文詮釋上有重要的作用。在進一步的文本選擇方面，單一文本的詮釋，必須有相關系列文本的互證，才能取得較佳的詮釋效果。筆者發現自班固以至時賢，如鄭文、李錫鎮等，對揚雄〈長楊賦〉之作，均是理解此作諷諭的主題為：漢成帝過度田獵，並大張旗鼓招待外族，導致人民生活受到影響。揚雄則是站在子墨客卿的立場，對於翰林主人此一行為作出反諷，這便是文論一貫以為此文屬於反言若正的基本原因。但細詳文本以後，則足發見翰林主人舉述自漢高以來，朝廷懷柔遠人，以至武帝朝以後，舉兵征伐，「天兵四臨」，但「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的史實。子墨客卿始說明雖「今朝廷純仁」，但校獵長楊，實有國防的需要。為了「使海內澹然，永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則使匈奴「多麋鹿之獲」，實亦不過「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的恰當政治策略而已。

揚雄這種「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斲費者不永寧」的政治主張，於永始四年 (11B.C.) 十二月奏〈羽獵賦〉，已早見其端倪，

故謂：「仁聲惠於北狄，武義動於南鄰。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則天子羽獵，自有展示軍事力量，強化外交聲勢之作用在。至於受命於成帝，撰寫的〈趙充國頌〉，揚雄表揚充國平羌之策本為「既臨其域，諭以威德」，即以戰迫和，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上策。惟以酒泉太守辛武賢力主作戰，反對充國屯田之法，故謂「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迫於以武力進剿，但平定以後，充國仍然「營平守節，屢奏封章」，以此長策，而「在漢中興」。則揚雄以此賦暗示，當漢中興之時，猶以屯田為長策，反觀成帝之世，度德量力，對外夷當以撫而非剿之策明矣。至於哀帝建平四年（3B.C.）的上疏，是揚雄對邊疆民族的一貫政治立場，最為明確的一次表態。該文之精義，乃在匈奴「真中國之堅敵也」，是故，不許其內附歸命，則「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這不僅不是他第一次對相同政治問題的表態，也不是唯一的一次政治表態。這種政治取態，始自〈羽獵賦〉，顯於〈長楊賦〉，以〈趙充國頌〉為例，最後策定於〈上書諫勿許單于朝〉。歷成帝至哀帝，凡二世，並無改易。由是而知，單根據〈長楊賦〉作為孤立考察的文本，以描述揚雄的政治立場，是多麼武斷而危險的一種詮釋方式！

四、比對研究法的進路

本書第三章主要採用「比對研究法」，此亦人文學常用之工具，然而，比較之範疇有大有小，筆者於第三章中所關注的對比，即為先秦諸家美學思想的範式，與漢代新興文學家強調「詩賦欲麗」的嶄新美學觀的不同。以此察照身為活躍文學創作者（尤其賦

作)的揚雄，如何面對這兩項衝突的範式，以求出一條調和的道路。

揚雄是中國美學史上，其中一位最富爭議的思想家，他對藝術觀念的反覆探討，以致後學對其思想聚訟紛紜，乃是由於揚雄是西漢儒家審美者中，極具反省能力的藝術家。在面對先秦既有的「美言不文」價值主調，與「詩賦欲麗」的新興模式對立情態下，揚雄堅持在家國價值理想的範圍內，強調文學必須重視形象的直覺訴求。是則，他在承繼《詩經》重視文學教化功能的同時，強調情志在審美的重要意義。

是故，非深辨先秦與兩漢美學疆界的殊異，則不足以見出揚雄為秦火以後，真正稱得上重建儒家之審美典範者。他一方面要承傳先秦儒家的審美觀，另一方面又得照應身處西漢藝壇的新特性，這無疑迫使他逐步釐清各項藝術上的主要議題。其中最突出的區分，則在辨析感官刺激之不同於美感經驗。藝術的功能並不在於挑動個人情緒，過於強烈的情緒衝動，固不能誘發作者把情感以藝術媒介表而出之，亦無助於藝術欣賞者以觀照的態度，投入藝術作品中，達到物我兩忘的境域。揚雄本人對賦作，不獨有理論的了解，更有大半生的實踐。是故，他深深明白這種對感官挑動過度的「淫」，若同時未有足夠情感輸送予讀者的話，則其文遠過於其質，則距離文學作品以情志交流的宗旨日遠，故他才有「辭人之賦麗以淫」，而此類作品必不為孔門所接受的感嘆。如果以前述理由推之，則這種強調官能刺激的作品，不獨儒家的藝術觀不能接受，道家以觀照為主的藝術觀點，亦難首肯。揚雄這種「有我」的儒家文學觀點，正足以影響魏晉文學重視「人格風采」(尤其建安風骨)的藝術取態。